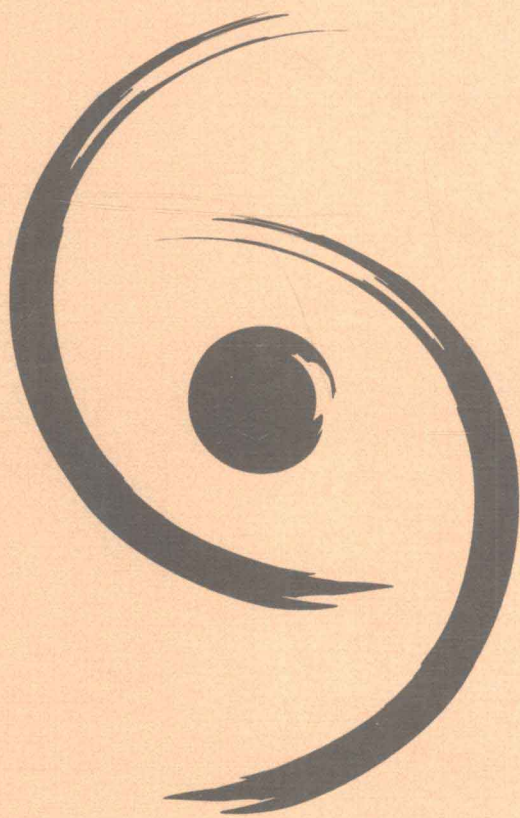


李幼蒸◎著

仁学与符号学

通向人文科学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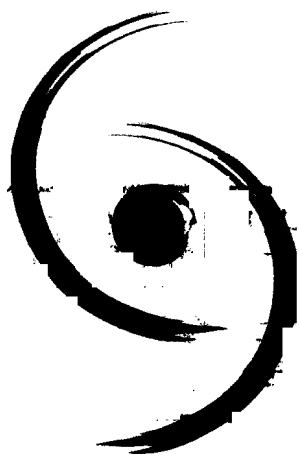


重庆大学出版社

李幼蒸◎著

仁学与符号学

通向人文科学之路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仁学与符号学:通向人文科学之路/李幼蒸著. —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624-6412-9

I. ①仁… II. ①李… III. ①仁—研究②符号学—研
究 IV. ①B82②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0756 号

仁学与符号学:通向人文科学之路

李幼蒸 著

策划编辑:李金正

责任编辑:杨 敬 王便利 版式设计:李彦生
责任校对:陈 力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83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720×1020 1/16 印张:24.25 字数:409 千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24-6412-9 定价:58.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理论话语和现实语境

2010年5月,相当偶然地,四周间在京、沪、杭做了10次讲谈;2011年2月,也是相当偶然地,一周间在渝、蓉两地又做了5次讲谈。与各地师生讲谈和对话的经验与独自思考著文不同,话题和方式都须针对具有积极思想交流潜力的众多对话方,而彼此的对话又都活生生地被置于现实语境中。对于我这样一个欠缺师长才能的人来说,不免惊讶地发现,“听众反应”和“读者反应”很不相同。早就多次表达过的学术意见可能并未引起“读者”多大关注,而同样的意见在讲谈的活生生的现实语境中却有可能引起更生动的效果和更积极的反应。于是我想到,是否应该完全按讲谈的方式来重新组织一下相关的学术思想和意见,以使读者获得类似于听众所获得的那种认知效果。然而这样做,实际却并不容易。一来我自己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讲话录音的习惯;二来,即使将每次讲演录音交我使用,我(在心理习惯上)也不可能通过所录原讲完成一份现成的文字稿。我的习惯一定是重新编写。是的,我的任何“二次性写作”都只能是重新编写(所以我从不可能自己准确地完成自己写出的中英文对译工作;我一旦重回原先的文字,一定会重新组织思路,因为每一次写作的心理背景都不会与前一次相同)。因此,对于上述想法,最合理可行的办法是:按照原先讲演的提纲、对讲演的记忆以及对讲演对话的体验来重新进行编写。这样的编写结果,我相信,就文字内容而言,一定比系列讲演的内容要更可取些。因为,每次讲演内容不仅因此获得改进的机会,而且系列讲演中不同的讲演之间还可以加强彼此的联系和统一。这固然是理想的方式,但哪里容易抽出时间来做呢?

实际上,我的每次讲演内容所传达的都是我最近经常“思考”的一些题目。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一口气完成一次讲演的缘故。而那些正在思考的各种题目,又多半是最近写出过、发表过的文字,主题和意念却可能散落在各种不同的篇章之中。于是我想到,凡是在听我讲演和座谈而对课题感兴趣的听众,其后若能再读我的文章,就会更能抓住要点。那么我为什么不先将作为上述15讲内容之“来源”的各篇文章先行汇集起来充当相应的读物

呢？这就是我这次从重庆、成都回来后马上集结一个集子的理由。

我长期以来研究的课题——符号学、现代西方哲学、仁学、儒学、人文科学现代化等——之所以不容易被清楚把握，主要因为它们都具有跨学科特点。而学界多数人所熟悉的是单学科论述方式。现在，所谓人文科学理论的前沿进展，应该说主要就是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演变。我的相关论断和说明表达于各种不同学术门类和主题之中，而它们彼此也有一定的联系性。这种联系性只有通过细心比较不同篇章中的类似论点来加以把握。通过一年来与各地师生密集的交谈对话，我深信青年一代学人是会了解符号学和解释学的人文思想旨意的。在此我却不得不指出一个最近以来越来越清楚的现象：对于把握跨学科、跨文化人文科学理论发展来说，外文界、中文界、传媒影视界的理论爱好者们，似乎比哲学界的研究者们更具有对其理解和接受的可能。其实这一现象不难解释。跨学科理论当然就不是哲学本位主义理论。哲学界处于一种矛盾情境：一方面它是传统上“理论思维”的“大本营”，而另一方面其两千年之久的科班性也导致业者习惯于把诸哲学大家的现成著述结论就当成了各种“权威理论”。因此，其理论观反而从结构上趋于内容固定化和思路凝滞化。结果，一谈到“理论”，“哲学家”就马上向现成的哲学学派路线挂靠。这样的倾向也反映了哲学专业本身就包含着某种文本“自足性”或与外在现实隔离性；换言之，哲学家倾向于“脱离实际”，也就是“脱离世界”。如果再加上可能出现的其他学术外的因素，如哲学家仍然以为“哲学是众学之王”而自己已是哲学王国的成员，就会进一步增附某种“理论自足感”，从而对其他理论思路产生排斥（特别是当他们还欠缺哲学以外的他科知识的话！）。因为，说到底，哲学家的心志可能不是在朝向“真理本身”（“真理”往往仅成为他们的语言游戏筹码），而是朝向某种“哲学势力”（仁学的本质之一就是抗拒任何不当权势，而历史上“哲学家”中往往不乏依势而行之辈），这也正是今日哲学界最易产生的自我滞后之惰性，并势足以阻碍其思想前进，因此特别值得大家警惕。本人曾以哲学为人生最高志业，此一体察，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反省吧。

那么，为什么那些本来其专业并不要求理论化的部门反而会维持其较高昂的理论兴趣呢？这一现象实乃社会文化朝向理性化、科学化演变的结果：青年一代学人自然地滋生着理论思维要求；换言之，例如，中外文学界、传媒界、影视艺术界等领域内的新一代理论工作者们，开始要求对各种现实研究对象增加理性的认知，也就是要求各自专业的理论化提升。也正因为未曾受到严格哲学性规条的束缚，他们反而易于注意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门类中的多元化的理论成果。而后者正是产生于同一思维方向中的：

新理论往往来自对各专业中的现实对象进行创造性的理论化思考;即各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符号学和解释学就是这样的学术思考习惯的产物;后者看似“表述方式特异”,实因勇于朝向新的现实对象,新的精神目标和新的思维方向。当然,中外文学界和传媒影视界的学者们或许还欠缺足够充分的理论训练,但他们却可能处于时时朝向理论化思维的生命冲动之中:他们“渴望”学习各种对课题现实并具有有效说明力的新理论!(而哲学却往往只能提供著名哲学家们的陈旧哲学结论)这就是我一年来的15次集体接触和众多单独接触中获得的体认。这也可说明为什么是文学界、传媒界、影视界的人文学者反而对符号学理论更为关注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们如此“看好”人文科学中哲学以外的其他各界,主要是指看好其成员可能具有更广阔的开放心态。学者只有“知有不足”,才能产生继续学习的冲动和意愿。并不是说,文学界和传媒界已经现成地具备了较高的理论知识水准。其他各界和哲学界一样,如果不以向真、求真为最高目标,同样会趋炎附势,追逐潮流,甚至于比哲学界更严重(如外文界由于会外语可能更易追逐外国时髦而又一切以所选择的外国学星之名气大小作为自身选择依靠的标准)。就此而言,我一贯说的“心术学”岂是蹈空之论?

无论中外学界,逻辑学和语言学均为符号学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本身不就是哲学吗?应该这样来看这种现象:逻辑学和语言学既都是文化符号学的“组成基石”,又都是哲学的“组成基石”,它们本身具有独立的、偏于技术性的自足运作域,本身学术不需要处处介入各哲学流派的“哲学讨论”。两者的技术性使它们既可安全地参加符号学界,也可单纯地参加哲学界。正由于不必受制于具体哲学学派立场,所以也不易产生对跨学科的“理论性抵触”。所以,逻辑学和语言学都是符号学的可靠“同盟军”。

在此我们还要涉及一个更为“吊诡”的现象:由外语系转为哲学系的哲学专业人士。他们的外语系背景本来应该使他们亲近符号学,而实际上往往相反。为什么?这一现象是由两种“合力”促成的。作为本科学习阶段在外语系度过的学人,他们当初并未充分获得任何科学专业训练(个别人作过的努力除外);但他们的外语能力其后却有助于他们先一步接触国外哲学内容。而此“接触”本身也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是“快捷”,因为有了外语能力;而另一方面多半是“速成”(欠缺足够的知识基础,但更主要的是:外语能力引生的急功近利诱惑:不难在两种语言世界间直接转录原著)。结果,他们反而最易于成为哲学学派的拥抱者,即利用外语的快捷来弥补知识基础的欠缺,通过迅速的哲学学派“选边”来站稳业界的脚跟。这样,他们也就自

然而地易于成为表面上的“哲学原教旨主义者”(这样他们就可以摆脱学习他科知识的压力了),后者自然会倾向于反对来自符号学的任何“异端理论”的“干扰”。如果个人竞争求胜意识强烈,他们的功利主义意识就会远大于追求新知新学的意识。此一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自然发生的吊诡现象,颇有可能影响民族文化学术发展的大方向和文化的依存性格。对此问题,本文集多有论述。

跨学科的理论发展趋向其实反映着一种世界人文学界的正常演变方向:人文科学界各科的相应理论化追求,明显地超越了传统哲学类理论形态的范围。这也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今日国内外符号学世界的中心问题变成了跨学科理论和哲学中心主义理论的互动关系问题。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已成为国内外人文学界的最主要问题。符号学和解释学要想健康发展下去,必须面对这个尖锐而艰难的主题。为此,既需要强化哲学专业研究,也需要扩大人文科学各领域的理论研究。必须指出,今日西方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认知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将在中国学区建设全方位理论研究的平台。哲学和符号学的关系如此重要,我遂在访问四川大学哲学系和文新学院时将在四川的最后两讲定名为“符号学和哲学的关系”及“仁学和儒学应该并可能加以区分”。前者的思路正是“跨学科”,后者的思路则是“跨文化”。就中国人文学术而言,符号学、国学、人文科学现代化,应该给予统一思考。我在川大文新学院主持的百家讲坛上,一开始就对川大哲学系和文新学院给予我的讲演机会表示感谢,因为我在两次讲演中提出了这两个在我看来是具有(不仅是对国内人文学术界而且是对国际人文学术界)高度重要性的学术课题。如果我在西方某大学的讲演中提出同样的讲题时,我就不会在讲演开初做这样的立场宣示,因为这不会在西方高等学府内产生任何积极的反应。而在自古人才辈出的四川高等学府,我却陡然产生了这样宣示的冲动。这是因为我直接感受到了某种民族文化精神仍然漂浮在中国的校园里:我们的知识积累或有不足,而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灵却仍然活生生的向四面八方敞开着。符号学和哲学的互动关系,是今日世界人文学界理论能否前进的关键所在;仁学和儒学的互动关系,这是人类伦理思想和历史现实互动关系的区域性缩影。(两次讲演均无讲稿,但据悉已有音频文本上网)我愿在此告知读者,我在2012年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上的讲演标题将是:“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和符号学的未来。”仁学,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信仰方向问题;符号学,直接关系到人类人文科学的理性化发展的问题。在此,让我对文新学院曹院长、赵毅衡教授以及哲学系熊林主任热心的安排,表示感谢;特别是赵毅衡教授还通过原先的学生和朋友为我安排

了在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以及西南大学的三次讲演。我也须借此机会对原川大教授、现任山东大学高等儒学院的黄玉顺副院长表示感谢,他在我甫从四川返美后就安排了院刊对我的相关议题的访谈录,使我有机会继续讨论川大百家讲坛中\上的重要议题。所以我也将此访谈录原稿列于文集末尾了。让我在此以最简洁的方式再次提出仁学与儒学作为“信仰学”(而不仅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本质区别。

仁学(表达于孔孟)是指学者的伦理性态度和动机的结构,后者植根于文明史上千古不变的“人性”;其目的是从伦理性原理出发以提升一切人的伦理品性;由于构思及编织于秦汉专制时代之前,故几乎未受到王权势力的操纵(后来掺入的伪文句除外);今日提倡仁学,就要明确地提倡个人伦理态度和动机的伦理化提升,这种思维运作域是具有超时空性和普适性的,故完全可行之于现时代。

儒学(表达于五经),其中虽然掺入了孔孟部分语句,其文本编织的前提、条件、目的、运作和效果(这些就是符号学分析关注的结构性和功能性方面)等完全受制于古代帝王权势与制度,是彻底为王权利益服务的;而其涉及的信仰、学术、技术等知识性部分,已经完全落后于科学时代的水准,故明显地不可实行于现时代。

我必须再次重申:这一议题的重要性,是指我们对议题呈现方式本身的重要性,而并不是指可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方案。对于人文学者,要务在于明确问题的性质和设定问题的表述方式。然后据此准备相应的知识。永远要记住孔子所说的“学与思”的互动关系,思,一定要辅以学。思想过程永远得是与研读过程“齐飞”的。所以,我们既不可让海内外排斥知识研习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污染我们的智力,也不应该让任何一种所谓不同于中国内地旧时期理论话语的低层海外华裔学术话语廉价地充作替代品!他们根本欠缺足够的现代思维手段处理这种复杂的思与学、知与行的关系。

实际上,新时期30年以来,中国内地获得了百年来最好的研究人文科学理论的客观条件,而且各处出现了新一代热衷于理论探讨的青年学人,包括越来越多的青年女学人。记得1982年在多伦多国际符号学夏季研究班上我首次注意到有这么多欧美女学生对理论思维如此关心(特别是对于福柯和艾柯的讲演),这在中国内地当时还是难以想象的。而最近的观察和经历让我看到了中国内地的“女理论家们”也在到处涌现了。我还得指出,一般而言,中国内地青年一代的人文理论热情似乎远比港台青年要强烈。尽管我们处于人文学术发展问题重重的过渡时期,我却再次感觉到中国人文学界存在着一种令人鼓舞的(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这就是青年一代的知识热情和理论热

情！究竟是因为地大物博才得以使得中华传统文化不致被商业化大潮所完全吞没，还是反映着中国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呢？海外华人地区，其所谓中华文化遗产，所指的主要是物质性文化而已，他们哪里还有什么高级人文思想热情！“美国梦”和“恭喜发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口头禅，年薪和身价，这就是广大青年所关心的。难怪比尔·盖茨的形象已经统一了全世界的“理想偶像”。当此之时，我反而在中国内地青年学人一代中再次感觉到了某种“纯洁的理论渴望”。这就是思想源泉，这就是精神土壤！它深深地、默默地植根于几千年的仁学传统中。如果说在古代它主要体现于诗词曲赋之中，如今它主要体现于学术理论追求的冲动之中，从而表现出了一种中华文明的真正博大精深，一种与时俱进的学术雄心和精神境界。然而，也要看到，任何文化热情都需要切实的实践渠道。为此，青年一代人文学者首须勇于追求知识，敢于将精神热情转化为日常的艰苦学习。为了有效地学习自强，当然先得知道自身实际的学术条件和现状。于是，我就在本文集涉及的不同课题中和从不同的角度上，坦率指出现实中的人文学术发展中的问题所在。如果不能认真地面对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实际问题，不能认真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理论热情就难以最终成长为理论果实。我愿在此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文学术未来的发展，绝不可能由任何来自海外的学术思想方式加以直接指导；任何海外优秀学术思想资源，必须经过中国学区内部的创造性消化和改进才可以成为中土积极的精神及学术力量。

最后，我还想提及一桩私人的小小体察：70后、80后一代的青年人文学者似乎对我这样的独立学人表示出了更友好的态度，这和我在20世纪80年代与直接来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当时青年学人的“不睦关系”似乎形成了对比。为什么？也许因为前者当时更关心个人的成功因此视我为竞争对手，而后者今日能更关心个人的知识进步吧。我愿把这种体察也视作现时代学界进步的一个表征（这当然不是指我个人的感受本身，这是不重要的，而是指从这种个人感受中所反映出来的新一代集体行为倾向本身）。让我把这本文集就奉献给中国年轻一代的人文学者吧。

这本集子当然也是对不久前访问重庆大学及重庆大学出版社的一个纪念。首先要对陈晓阳副总编的接待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陈进与李金正两位青年编辑还曾带我游览了古镇磁器口，登山俯瞰了嘉陵秀色。最后更要感谢陈进、小兵夫妇在四川大学陪伴我参加了几次学术和聚会活动。两天来的多次交谈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了青年一代学人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力。

李幼蒸

2011年3月9日于旧金山湾区

目 录

上编 符号学与仁学

中国符号学和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

西方现代理论在东方六朝古都 ——“南京第 11 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历史意义	003
中国符号学的“身份”、任务和潜力	029
写在 2008“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召开之前	037
除夕感言:谈“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意义	044
仁学和符号学的历史交迁 ——论东方智慧和西方理论的辩证互动	055

符号学和人文科学

漫谈符号学的学术功能辨析 ——论“创作”的思想性与“研究”的理论性之别	072
中国内地讲谈五月行 ——兼论人文科学的现状和未来	098
符号学与人文科学研究	131
中国符号学与西方符号学的理论互动	139
漫谈“中文系”与“中国符号学”	157
新世纪人文科学前途和仁学伦理学 ——人文学术革新的逻辑路线:“诊断”而非“处方”	165
符号学:人文科学整合的新世纪火车头 ——欧美中心主义 vs 全球化沟通	182
20 年后重访西班牙:符号学万里行	191

下编 仁学心术学和中西学术

仁学和学术心术学

“理论翻译”和人文科学前途	
——论“以译代研”趋向的长期后果	201
论 20 世纪 80 年代人文学术的先天不足及其后果	224
仁学心术学的学术后果	246
学术实践中的虚与实	251
仁学三书和学术真理(增补稿)	
——2007 岁末感言	260

西学

百岁法国大思想家列维-斯特劳斯辞世感言	274
列维-斯特劳斯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启示	275
论“重读胡塞尔”的必要性	292
胡塞尔 vs 海德格尔	304
电影理论和符号学:“80 年代”忆往	308
与伊格尔斯交流历史理论思想	
——兼析国际人文学术交流之倾向	316

国学

仁学伦理学和汉儒意识形态英文书再版感言	333
中国人本主义伦理学	336
再论顾颉刚学术的国内外意义	
——写于《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	345
历史上有两个孔子:孔子 1 与孔子 2	355
《论语》vs《易经》:何者为中国之“圣经”	358
仁学解释学:孔孟思想的符号学诠释	
——李幼蒸先生访谈录(山东大学《当代儒学》编辑部)	
.....	361

上编

符号学与仁学



中国符号学和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

西方现代理论在东方六朝古都

——“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历史意义

1. 符号学在中国发展的意义

中国符号学的意义不仅相关于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问题,也相关于世界人文学术发展的问题。中国符号学的努力,不仅相关于中国人文科学的进展,而且也相关于世界人文科学的进展。世界符号学进一步的发展,某种意义上,甚至于也有待于中国符号学的实质性发展。符号学,从理念上说,是今日国内外人文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方向和标志之一。人类对人文科学的高度期待,与当前国内外人文科学的“相对落后”,形成尖锐对比。“乏效的”人文科学之职业性有效存在本身,反而会遮掩人们对人文科学改进必要性的认知。所以今日,一方面,就其科学性而言,人文科学大大落后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另一方面,就职业性存在而言,人文科学的落后性又被有效地掩盖着。符号学,首先可发挥一种关于人文科学“有效”与“乏效”间微妙关系的“检验器”作用。而学界对此问题的理解,却又面对着多重的“解释学的”阻碍。所以,尽管人们早已熟悉符号学的“字面”,却并非容易把握其深层的意义;对此,国内外、东西方皆然。但是,国际性符号学活动,也使我们有机会来重新观察和思考人文科学世界之性质及潜力。也就是,国际符号学大会将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以来的百年后在中国举办一事,给我们带来了对中国人文科学及世界人文科学进行全面反省的新机会:不再是只在西方学界而且也在东方学界进行这种深刻的学术反省;不是在其学术现代化时期比中国更久的日本和印度进行这种反省,而是在有着三千年人文学术传统而其现代化时期开始较晚的古老中国地区进行这种反省,其世界性的启示意义,尤为深刻。

2. 符号学就是跨学科方法论

为什么人文科学面对社会、历史与文化进行说明、解释和预测方面欠缺效能?就实际运作而言,主要因为欠缺学科间的充分有效沟通。单学科内的成果,相当于各种“材料”,材料加工为“成品”,则需要“跨学科”的沟通与合作。为什么跨学科学术活动难以形成?首先因为学术的专业化、职业化的不断强化及其成效主要体现在单学科内。符号学,就是跨学科(包括作为“扩大跨学科”的“跨文化”)学术活动。因此,符号学有助于学科间的沟通,从而有助于人文科学各学科从各自的“半成品”转化为跨学科的“成品”。这个问题、任务和过程,是全球性的。西方超过东方之处为其各学科内部的“半成品”数量和质量的优越性;但也与东方一样,在从专科的半成品转化为跨学科的“成品”过程中(也就是在学术语境和眼界扩大之后),遇到结构性的发展瓶颈。现代符号学运动理念的目标就是要克服此学术结构性瓶颈。就达成此目标的条件而言,中外学界的机会是一样的。而潜在地说,中国学界甚至还“辩证地”具有更多的机会及实现的条件,并因此也就增大了其在国内以至世界的学术责任。因此,符号学事业,要求学者逆反于时代商业化洪流,发扬学者主体的伦理学精神(仁学精神),力反职业化的专科间求利、互斥的本位主义,而朝向集体学术求真的知识理想,从而有望强化独立的学人主体意志,以克服全球性的学术商业化倾向。即将到来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则是在史地和文化扩大的规模上,为我们提供了追求学术理想的一个“实验性的”学术平台。

3. 跨学科方向的知识结构调整

固然,学科分划的职业本位主义是符号学跨学科活动的根本障碍,此本位主义也含有不同层面。一方面是竞争关系导致学术实践的功利主义,另一方面也含有知识结构调整中的内在惰性。符号学的根本诱因是对学者扩大与深化求知欲的呼唤(智)。而此动机又牵扯到学者在知识调整中所要求具备的追求理想的毅力和决心(勇)。而决定此智与勇品质的,则是狭义的“仁”:即求真之心志。有了求真之志向,才会有求知之手段,也才会有求知之魄力。为什么学者对跨学科活动没兴趣?因为他并未正视自身的知识缺欠,因为他害怕追求新知的艰苦,因为他急于在行业内“求成”而无时间、无魄力“另起炉灶”。因此,他也就根本上欠缺了求真知的热情和勇气。学者如欠缺具内在“智仁勇”品质的伦理精神动力,就不免会随波逐流,以求功求利为已足。学者所依据的仅只是自然获得的主客观求知条件(旧时期的旧积累和新时期的新潮流),而缺乏自我更新的大智大勇。就此而言,我们

提倡的符号学跨学科合作,当然仅只是就理想境界而言。我们如果难以在现实中充分达成此理想,却必可在现实中达成此理想之“真实而有效的呈现”。“符号学”的精神首先并不体现于以其为标名的任何固定学术内容(如在哲学、语言学或文艺批评领域内的具体专业课题内容),而是体现在人文科学范围内的某种创造性的治学心态,是朝向人文科学现代化勇进的探索心志。所以我们说,符号学是“仁者之学”:真正的符号学家是指那些在人文学术内部能够奔(bèn)向理想、力克凡俗、勇于自我更新者。现在,出现了有利的特殊客观机会:国际符号学大会将在中国地区举行。这将促使我们关注世界人文科学理论界的一个主流领域,并就近了解其现代化革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此,其作用首先应是激发中国学者在知识上的自我更新的认知和决心,而对此目的而言,首先是冷静检视自身知识及其结构的欠缺。现代西方理论和古代东方历史间的此一象征性的“碰撞”机会,一方面可导致西方学者在理论层次上注意东方历史的存在,另一方面可导致东方学者在理论层面上的提升和分析的精密度。国际会议是一次为双方提供向对方学习和批评的机会。目的不是各自炫耀自身,而是丰富自身,甚至是丰富其他对话方。这一国际学术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自我求知,助人求知;通过此过程可创造性地体现和复兴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精神传统:关于人的“学”(《论语》的第一字)之传统。仁学,即人学,即人文之学;所以中华仁学与现代世界人文科学具有本质上、结构上的亲缘关系。

4. 符号学与中国文艺理论建设

符号学被称作“文化研究的逻辑学”。其实更准确的说,目前世界符号学的主要领域应该是“新文艺理论研究方向之探索”。其主要研究对象是语言、文学和艺术。尽管符号学相关于人文科学的一切领域,但特别相关于文艺研究领域。此一特点还相关于“文艺”本身身份的二重性:文艺,作为“文艺创作”和作为“文艺研究”。其古代原始形态为:文字运用和文字研究的构成二重性;诗作和诗话的构成二重性。其现代形态之一为:小说电影创作与其研究分析。与其他人文科学不同,文艺学的“辩证法”正表现为其构成与功能的二重性以及作为文化现象的一体性。因此,文艺现象的构成与功能的复合性,特别适合于作为符号学分析的对象。

中西古代文论和艺论与现代文艺科学,分属截然不同的两套学术实践类型。因为前者产生于前科学时代,后者产生于科学时代。如果连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化”和“现代化”尚且发生于19世纪,在自然科学影响下陆续产生的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其历史也不过百余年,不过是尚处在其

形成与探索阶段而已。现代文艺理论学术,显然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后的附带产物。百年前中国主要从日本学界引进的“欧美文艺理论”(西方的和苏俄的),具有一种相当于“思想速食品”的特点。其不成熟的缺点之中最突出的几点如下:

(1)理论与社会性实践之间具有一种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关系,侧重于选择性理论的应用技术,疏略于理论本身的独立钻研。其直接产物为:不是学术理论性话语,而是“故事编作型”话语(文艺小说和故事电影),成为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的主要表达形态。结果“理论”仅成为“创作”的一种“助产士”。现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海内外华人社会均如此)的根本问题是现代理论知识的欠缺。因为面对欠缺人文知识的“大众”之小说编作,是不需要多少理论知识的。如何处理创作和理论的关系,乃是今日中国新文艺理论发展中的首要问题。

(2)由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欠缺,文艺理论与前者的关系极为松散,因此两者百年来同样欠缺充分的知识基础,其结果是导致一些文艺理论家倾向于用中西“玄学话语”充作“理论基础”。应当说,百年来把文艺理论并非合乎专业地(也就是仅象征地)建立在,例如,德国古典哲学或中国古代玄学的话语(老庄)之上,成为“掩盖”其欠缺科学理论基础的一种理论化“妆饰”。一些好读书而不深思的文史哲“理论家”们,往往把能够“读赏任何一种玄学话语”当成了一种“理论分析能力”,以为在自己的文艺或美学论述中插入一些抽象词语(特别是哲学类词语)就算是提升了论述的“理论”层次。殊不知,在哲学史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之间,还需要一种“科学性过渡”的知识准备。不仅是古典哲学,就是现代哲学,也不能随意插入文艺理论论述中而忽略有关两者之间“逻辑相关性”的思考。在论述话语中混杂地谈论文艺和哲学,其实正是“不够专业”的表现。

(3)但是,也并不存在一门系统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大全”,可供学者现成取用。时当新世纪之今日,我们面临着对此社会科学世界进行进一步整合的需要。专业知识的形成是学科内的事,而该知识的有效运用,则是“跨学科”(包括跨文化)的事。而跨学科的学术运作也需要专门的知识准备。符号学就是这种知识准备中最重要的一种。所以说,符号学是一种人文社会科学运作的“催化剂”和“黏合剂”。

(4)此外,符号学本身也恰恰是欧美当代文艺理论中的“第一显学”。因为文艺理论本身就是某种跨学科研究的产物。这样,符号学对于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现代化的任务来说,具有三重意义: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整合的催化剂;作为跨学科理论研究的领域;作为“跨文化”理论建设的领域。“中国符